



轉型中的中國宣教

余雋瑞

中國在變動當中，而且變化的範圍越來越大、速度越來越快。鄧小平時代推動改革開放，以四個現代化為目標，進行農村然後城市的經濟改革，較為單元，以經濟掛帥。江澤民在新世紀提出了三個代表理論，重申共產黨領導的角色和思想形態，在經濟上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在文化上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在政治上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較切實面對多元的局面，而同時堅持團結於一

黨專政的領導下。在江的新思維領導下，已有一套十一本的《「三個代表」與中國共產黨治黨治國方略研究叢書》出版，似乎中共已找到了廿一世紀的治國理論和策略。若「三個代表」能團結黨領導和群眾，中國未來的變化將會更為急劇和可觀。

外在因素如加入世貿組織及主辦2008年奧運會等事件，亦會加速中國的全面開放和發展，加強中外的交流。新的轉變會為中國宣教帶來甚麼變化？宣教的策略和方法是否需要重新部署？以下分享一些初步的觀察。

一、轉型中的中國社會

中國社會已悄悄地由一個靜態社會，變成人口最流動的國家，而且人潮只有一個方向，從農村進到城市。從1949到1979年的30年間，只有10%人口從農村進到城市，戶口制度限制了人民流動的自由。從1979到1999年的20年間，城市人口由佔總人口20%增至30%，農民湧到有外資設廠的城市找工作。戶口制度受衝擊，不得不逐步放寬。中國政府已認識到過去經濟增長的神蹟，是有賴廉價的農村勞工，現已調整政策，由管制轉為促進。據估計到2015年，城

市人口將增至50%，在21世紀的頭15年將有三億人口注入城市，平均每年有二千萬人口流進中國各大城市。這些日益增加的城市新移民，一方面是帶來城市物資繁榮的廉價勞動力，另一方面也是帶來城市各種問題的根源。如何解決新移民在衣食住行、醫療教育等方面的需要，已成為大城市頭痛的問題。

毛澤東時代中國仍是農業社會，革命立國不得不採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鄧小平時代的經濟改革，也先以農村經濟改革開始，再進到城市經濟改革，都是先鄉後城。城市經濟改革雖然遇到錯綜複雜的問題，但這些問題克服了之後，城市的經濟便欣欣向榮，帶動整個地區甚至全國的經濟繁榮。因此，出身於上海市的江澤民，以治市之道治國，正配合中國都市化的大趨勢。三個代表的理論與實踐也必然先在城市推行，然後普及到農村。

加入世貿之後，外國資金會更多投入中國，特別在一些有潛質的大城市中，這些城市便成為資金匯聚的地方。同時，農村人潮湧進這些大城市，提供廉價勞工，促進了城市的發展和繁榮。知識份子的科技及管理人才，也會到這些大城市找工作，發展城市中不同的專業。難怪有不少中國城市已追上香港和新加



坡，充滿著五光十色的街道和建築物，現代化的節拍和氣息，及多采多姿的大都會生活。

看來，中國的宣教策略也需注重城市宣教了。其實，主耶穌及初期教會的眾使徒都是以城市宣教為重點，耶穌的短宣遍及各城各鄉，也是先城後鄉。保羅三次的宣教旅程在不少的省府及縣城建立了教會，也是按主耶穌的宣教策略而行，今日也適用於中國。



二· 轉型中的中國教會

因為中國獨特的宗教政策，中國教會徘徊於二極化的形態，不是合法官方的三自教會，就是較隱藏的家庭教會。三自教會集中於城市，家庭教會則集中於農村。城市中的家庭教會，受的監察及壓力較大，不容易發展，人數多在 30 人以下，且常

要轉動聚會的地方。

在六四事件後，出現第三種形態的教會。在大學校園中，大學生及教授出現基督教熱，他們有不少透過外國的基督徒在校園的見證信主。校園的小組查經班被建立起來，漸漸發展為小組教會，並在當中興起獻身傳道的全職同工。知識份子信主後，一般不願意參加傳統的家庭教會，因為信仰保守，傳道人又家長制，不能滿足他們理性的需求。

另一方面他們也不參加公開教會，因為他們抗拒被政權控制的教會。小組聚會是他們喜歡的，因為可自由討論信仰，又可享受相愛團契。小組教會成為家庭教會及三自教會以外，神興起的第三種形態的教會。

面對都市化帶來的大趨勢，三自教會受到的衝擊較少，因為教會中多為城市的信徒，在

城市中成長，較易適應城市的轉變。教會聚會人數多，人口的流動對牧養工作影響不大。農村的家庭教會卻承受著前所未有的衝擊，教會中的年青信徒突然消失，使教會出現斷層現象。年青的信徒都往城市裡跑，希望在工廠找到工作。最近有一位農村同工表示，教會中只剩下他一個年青人，其餘不是老年人就是婦孺。往城市跑年青人，有些鄉村高達 90%。有些農村教會已反守為攻，開始作城市宣教，但即時面對經費的缺乏。

有不少城市的知識份子尋求往外地或外國跑，不是升學深造，就是另尋高就或做生意。他們所屬的小組教會便面對人才流失，青黃不接的局面，加上聚會人數少，受人流的衝擊便更大。要克服人口流動帶來的問題，天國觀比教(堂)會觀更為適切，快速的小組繁殖及門徒訓練可保持城市的小組教會生生不息。城市中的小組教會有異於家庭教會的地方，是聚會的地點，不再在家庭中而是在信徒工作的地方：公司的辦公室或商店的閣樓。帶職宣教是今日在中國作城市宣教最有效的方法，提供宣教者自養的專業，建立小組教會的聚會點，及隨宣教者流動的基本屬靈裝備。過去海外教會進中國的唯一方式是帶職宣教，今日中國教會亦需要掌握這個方法，以面對城市宣教的挑戰。城市的小組教會最具潛力發展為主流教會，規模很快可追上傳統的三自教會及家庭教會。



三· 轉型中的中國 禾田

自中國於 1978 年開放以來，中國宣教的目標群體，也在不斷的轉動當中。第一個目標群體是農村的家庭教會，他們經歷了嚴厲的逼迫及屬靈的大復興。靈糧嚴重的短缺，有待海外教會的供應；傳道同工缺乏，極需同工的培訓。宣教的策略是服事家庭教會，供應靈糧、教材及培訓的老師。



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大學生及知識份子成為另一片的成熟莊稼。校園的查經小組，如雨後春筍湧現，他們需要查經組長及門訓導師作小組牧人。服事這個群體，須以帶職宣教身份，進到他們的圈子中。

九零年代，中國少數民族成為第三個被關注的宣教目標，緣起有二：一方面西差會把認領一民的宣教策略，應用於中國的禾田；另一方面，九一年的華福會也介紹了中國未得之民的福音需要。按官方的分類，中國有 55 個少數民族；按方言分類，西教士揚天民的最新研究顯示，中國有 490 個方言群體之多。面對這個群體，宣教的策略是認領一民，並且認領單位需要彼此間有伙伴合作，才能完成此使命。

踏入廿一世紀，中國的城市成為宣教的新焦點，亦是繼續向上列對象宣教的新據點。向農民或少數民族傳福音及幫助農村教會的最佳方法，可能不是到農村去，而是到城市這交匯點。城市新移民成為另一片成熟的福音莊稼，急待收割。

工廠是城鄉的交匯點，一方面是農村小伙子湧進的地方，亦是外國資金注入的據點，不單是城鄉經濟命脈，亦是福音遍傳的關鍵。為要有效地在工廠傳福音，基督徒老闆最好聘請農村教會信徒，讓他們在廠內一邊工作，一邊在宿舍傳福音。為要有效地防止年青信徒放棄信仰，農

村教會應把出外找工的信徒組織起來，成為工廠使命隊，在他們出外之前提供基本栽培和裝備，差派他們到同一廠裡工作，一同傳福音和建立教會，這樣教會反而失而復得。透過工廠宣教，福音可回傳到農村，甚至偏遠的少數民族。

帶職宣教是城市宣教的關鍵，專業的基督徒需有宣教的使命，作天國的門徒，在工作崗位上見證基督。若他們能接受事奉的裝備，便能建立小組教會，甚至培訓小組牧人。

四· 轉型中的宣教 事工

隨著中國社會及教會在迅速轉型中，宣教事工也在轉換新的模式。





1. 農村教會的差派及培訓:

農村教會自八零年代已展開差傳工作，只是過往都是差派工人往農村，現在他們已醒覺要向城市差派。但城市的知識水平高，宣教士必須接受更多的培訓。為這緣故，有一個家庭教會體系，在兩年前便將各地 20 個培訓點的課程，全部由三個月提升至一年。培訓的地點也漸次轉移，從農村轉到城市。

培訓課程也相應要調整，不能只講聖經、神學，亦須加入配合城市宣教的課題，如帶職宣教、工廠宣教、小組查經、門徒訓練、小組教會、基督教倫理等課題。培訓的師資更不用說了，要有多位素質高、有團隊牧養經驗的老師，這樣他們不但教得好，並且有合一的隊工，激勵受訓的同工。

農村教會差派宣教士往城市宣教，並不容易，因為城市生活指數高，食住及交通均需現

金。長久以來，農村教會供養傳道人在農村傳道，及舉辦培訓班，並不困難，只要有接待家庭提供食住便可，無需支付多少現金。如今要用現金支持城市宣教士，便倍感吃力了。因此城市宣教士要帶職宣教，自養是維生之道。農民要在城市中找職業，談何容易，他需要轉業培訓。用小額貸款，幫助宣教士開設簡單的店舖(如雜貨店、小食店)，作為自養店及宣教接觸點，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2. 城市教會的差派及培訓

城市的教會雖比農村教會有更多的人才及錢財，但差派工作遠比不上農村教會。三自教會因宗教政策及三自神學影響，並不鼓勵同工、信徒在教堂以外傳福音。城市的家庭教會，人數少能力弱，要獻身傳道需要個人莫大的信心，教會往往不能承擔經費或提供培訓。因此帶職宣教及在職培訓是城市教會推動宣教的

最佳方法，這一方面海外帶職到中國宣教的同工，可提供直接的鼓勵和幫助。

3. 海外教會的差派及合作

海外教會差往中國的同工，已從個人隱密的事奉，進到團隊合作的事奉。面對城市稠密的人口及多元化的挑戰，交流合作能夠提高個別及整體宣教事工的果效。

與國內教會合作時卻需要特別留心，在提供經濟支援時，切忌製造了倚賴，要從起初便考慮到如何幫助對方自養，因此小額貸款可能比奉獻更可行。在提供培訓教導時，避免分歧性的宗派教義，及與中國教會處境脫節的象牙塔式教導。與國內教會建立宣教伙伴關係，是促進中國宣教的關鍵，如何提供整全的培訓課程及培養國內的宣教培訓團隊是中國福音化的首要挑戰。■

(作者為中國宣道神學院宣訓部主任)